联合国 S/PV.8668



#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四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八六六八次会议

2019年11月19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 | | |
|---|---|---|
| 主席： | 艾哈迈德勋爵/艾伦先生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 | 比利时 | 贝克斯廷·德布伊茨沃夫先生 |
| | 中国 | 张军先生 |
| | 科特迪瓦 | 阿多姆先生 |
| | 多米尼加共和国 | 辛格·魏辛格先生 |
| | 赤道几内亚 | 恩东·姆巴先生 |
| | 法国 | 德里维埃先生 |
| | 德国 | 霍伊斯根先生 |
| | 印度尼西亚 | 斯伊哈布先生 |
| | 科威特 | 奥泰比先生 |
| | 秘鲁 | 乌加雷利先生 |
| | 波兰 | 弗罗内茨卡女士 |
| | 俄罗斯联邦 | 波利扬斯基先生/列普金先生 |
| | 南非 | 范沙尔克维克先生 |
| | 美利坚合众国 | 诺曼-夏莱女士 |

## 议程项目

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

和解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中的作用

2019年11月11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019/871）



19-37299 (C)








上午10时05分开会。

##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 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

## 和解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中的作用

### 2019年11月11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019/871）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阿塞拜疆、孟加拉国、巴西、加拿大、哥斯达黎加、塞浦路斯、厄瓜多尔、埃及、爱沙尼亚、格鲁吉亚、危地马拉、匈牙利、印度、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哈萨克斯坦、肯尼亚、黎巴嫩、列支敦士登、墨西哥、摩洛哥、纳米比亚、挪威、巴基斯坦、菲律宾、葡萄牙、卡塔尔、罗马尼亚、卢旺达、沙特阿拉伯、斯洛伐克、斯里兰卡、瑞士、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越南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以下通报人参加本次会议：乔治梅森大学冲突分析与解决学院院长阿尔帕斯兰·厄泽尔代姆先生和埃尔曼和平与人权中心方案和发展部主任伊尔瓦德·埃尔曼女士。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还邀请欧洲联盟驻联合国代表团副团长西尔维奥·贡扎托先生阁下参加本次会议。

我提议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和这方面的惯例，邀请罗马教廷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的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19/871，其中载有2019年11月11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信中转递了关于所审议项目的概念文件。

在这方面，我谨热烈欢迎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阁下，并请他发言。

**秘书长**（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联合王国主持召开本次辩论会，因为由国际社会支持的和解进程能够对我们所服务人民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成功实现和解有助于防止冲突再起，并且有助于建设更加和平、强韧和繁荣的社会，特别是在发生大规模暴力和侵犯人权行为之后。

从柬埔寨到卢旺达、北爱尔兰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解进程在解决族裔、宗教和政治分歧以及帮助人民过上和平生活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和解有助于修复因国家和人民之间缺乏信任而造成的裂痕，在这一进程中，机构和个人承认他们在过去罪行中所起的作用，受害者和施害者都鼓起勇气面对真相。通过这个进程，社会可以从分裂的过去走向共同的未来。因此，促进和解和打破有罪不罚的循环对于我们的各项工作不可或缺。安理会通过的相关决议强调，实现和解是保持和平的全面办法的一部分，这些决议一直是我们的指针。

我们都认识到和解的至关重要性，但我们的和解概念必须不断发展，才能跟上冲突性质的变化。它不能再局限于那些直接参与发动战争者。今天的冲突错综复杂，将邻国和大国也牵扯其中。社会、经济和政治不平等日趋严重，并因气候危机和各种新技术而加剧。民主空间正在缩小，催生基于身份的政治、歧视、不容忍和仇恨言论。今天的和解进程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深入、包容，才能应对这些挑战。

和解若要成功，就必须在个人、人际、机构和社会政治等层面产生影响。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和解在解决冲突根源方面的作用，其中包括气候危机、结构性歧视、不平等、有罪不罚现象以及导致激进化和暴力极端主义的分裂言论。

目前，我们看到，抗议浪潮席卷了全世界。虽然每起抗议活动都是有其独特性，但它们都有一些共同点，那就是，民众和政治机构之间缺乏信任，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负面影响加剧了不平等。我敦促各国政府以尊重言论与和平集会自由的方式应对这些抗议活动，并通过对话与和解来消除民众的不满，遏制明显的两极分化。

我们需要这样一种社会契约：它包容各方且公平；它使包括青年在内的所有人都能有尊严地生活；它为妇女和女童提供与男子和男童相同的机会；它保护病患、弱势者和身有残疾者。社会和经济改革可在促成和解方面发挥核心作用，这表明，必须革除只为少数精英利益服务的腐败做法和制度。今天的和解进程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首先，它们必须植根于受冲突影响的社区和社会内部。和解必须源自内部，所有人都必须参与其中，而不仅仅是政治领袖和政治组织。每个阶段都必须纳入妇女代表和民间社会团体。宗教领袖拥有动员当地各界支持和建立信任的道德权威。青年和边缘化群体天生就了解导致冲突的不满情绪，是至关重要的参与方。无视这些声音的和平协议与和解进程不太可能成功。

当地的自主意识和广泛参与对于挫败有权有势的精英逃避被问责及其排斥某些群体的企图也至关重要。此类操纵可能导致脆弱的协议，因为其中缺乏使各社区恢复团结的具体改革步骤和措施。成功的和解可以恢复民众对国家及其机构的信任。民众如果认为他们的机构合法，就会求助于这些机构，以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而不是诉诸暴力。

其次，成功的和解进程应消除受害者的痛苦和苦难，弄清犯罪者的动机，伸张正义，提供赔偿，并确保查明真相。不能伸张正义，就无法达成和解；不能查明真相，就无法伸张正义。如我们在危地马拉、塞拉利昂、东帝汶等地所看到的那样，设立过渡期司法机制、包括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可以成为实现这些目标的有效途径。它们可以帮助社会团结在一个肯定我们共有的尊严和人性的一致表述的周围。

然而，和解不能取代问责，也不能为国际法规定的各种严重罪行被赦免创造条件。安理会恰当地强调了对严重侵犯人权和违反人道主义法的行为追究责任的重要性。成功的和解机制在伸张正义的同时，必须促进平等和人权，即使在冲突前就不存在平等和人权的情况下，亦须如此。

侵犯人权行为对妇女造成独特的影响。过渡期司法必须成为解决性别不平衡，扎根于当地现实，并以广泛协商为基础的变革性司法。

（以法语发言）

联合国正在努力将和解框架纳入世界各国的缔造和平和建设和平活动。我们的调解人和特使正在强调达成切实可行的条款的重要性，包括在和平协议中纳入对话、建立信任与和解措施的必要性。我们还努力将解决以往问题的条款纳入各地、包括中非共和国和南苏丹在区域组织的调解下达成的协议。在这方面，我欢迎非洲联盟新的过渡期司法政策，这一框架考虑到了大规模暴力的复杂性，同时尊重当地涉及和解和正义的各种传统。

我们一贯强调过渡期司法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哥伦比亚以及其他国家。我们还为有助于集体治愈创伤的国家进程提供技术支持。比如，在突尼斯和也门，我们为促进全国对话提供专家咨询意见。联合国在世界各地支持国家主导、以受害者为中心的过渡司法进程。例如，在冈比亚，我们为制定过渡期司法综合国家战略以及设立真相、和解和赔偿委员会提供了重要支持。

我们将继续鼓励各国政府利用其国家能力，同时确保尊重国际准则。我们支持国家层面的对话、协商和政治进程，包括举行选举和起草宪法，这是促进以人为本的包容性机构的另一重要措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我们应对各种助长冲突因素、促进包容性治理以及对人权和人格尊

严的尊重的路线图。整个联合国系统正在帮助各国政府加强善治、法治、对人权的尊重、可问责的机构、基本服务的提供、性别平等以及青年和边缘化社区对政治进程的参与。

归根结底，和解必须建立在对导致冲突或镇压的机构进行重大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基础上。回顾、了解并且一道摒弃痛苦的过去是极具挑战性的。用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的话说，

> “在持续的暴力过后，治愈社会创伤和分裂没有捷径可走，也没有简单的药方。在原本相互为敌的人之间建立信任、达成谅解是一个极其艰难的挑战。”

因此，成功达成和解既是一个目标，也是一个过程。随着联合国成立75周年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十年的临近，惟有在各国人民和各国之间建立信任的基础上实现和解，才能确保所有人在一个健康的星球上享有和平与繁荣。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的通报及其就这一问题所发表的深刻见解。

我现在请厄泽尔代姆先生发言。

**厄泽尔代姆先生**（*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与诸位一起参加今天的会议，并感谢给予我在安全理事会发言的机会。请允许我真诚感谢联合王国常驻代表卡伦·皮尔斯女士阁下邀请我在本次关于和解问题的公开辩论会中发言。

和解是赢得和保持和平的主要因素之一。请允许我花一点时间向安理会解释一下为何和解对实现持久和平如此重要。

战争的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可悲之处在于，当战争结束时，为了实现持久和平，各方民众必须学会共处。受害者、施害者和受战争影响社区中的其他人将开始执行一项艰巨的任务，即，在政治上和个人之间相互达成和解，重新界定各自的敌人并重新赋予其人性，重建信任和问责制，并接受过去的遗产。

因此，和解是一个恢复破裂的关系过程，必须处理冲突的根深蒂固的伤口。和解也是关于学习如何非暴力地包容彼此极大差异。然而，冲突后社会是由具有不同冲突经历和不同文化准则和价值观的庞大、不同的行为者群体组成的。因此，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和解的概念意味着不同的事情，这并不奇怪。

对于孩子在突袭中被带走的父母来说，这可能意味着发现他们发生了什么，并看到肇事者被绳之以法。对于新上任的国家领导人来说，重点可能是权宜之计，埋葬过去，以便集中精力应对当前的紧迫挑战。对于前战斗人员来说，和解可能是他们能够获得宽恕或者重新做人的途径。

这就是为什么和解需要是一个量身定制的进程，它足够灵活以适应冲突后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动态。换句话说，从最低限度的角度来看，和解可能是为了实现共存的目标，而最高限度的方法则强调宽恕、处理过去以及重建信任的重要性。

我们还应该记住，成功的和解既是一个结果，也是一个过程。作为结果，它包括相互信任、认可和接受，以及对另一方的需求和利益有敏感的认识和考虑。作为一个过程，它需要纳入结构和心理上的广泛改变。

我们这些年从和解经历中学到了什么？首先，和解应该是一次改造的经历——不是关乎学习如何原谅和忘记，而是如何记住和改变。重建莫斯塔尔古桥（Stari Most）——一座位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莫斯塔尔著名的人行桥，本来可能是这种改造经历的绝佳机会。相反，国际社会建造了一座几乎一模一样的桥梁，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但却没有给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及波什尼亚克族在重建桥梁期间建造信任桥梁的机会。

第二，和解应始终基于当地方法、当地词汇，以及最重要的是基于当地行为者。然而，政治行为者经常对当地行为者的努力不屑一顾。但是，只有采用当地方法，我们才有机会弥合冲突留下的深刻

情感创伤。让我们记住，情感不仅仅是个人的反应，而且也是社会政治力量的基础，这些力量对于身份和社区的构建至关重要。因此，重要的是将和解视为一种重铸冲突的情感遗产的方式。

第三，和解的不同层面——人际、群体间或国家间层面——要求不同类型的参与。因此，我们需要考虑不同类型的当地行为者。地方当局和市政当局及其作为内部和解者的潜在权力经常被忽视。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严重轰炸的英国考文垂市，在冷战期间领导了一次令人惊叹的和解行动，并与铁幕国家饱受战争蹂躏的城市，如德累斯顿、贝尔格莱德及华沙合作。让我们赞赏像霍华德教士长这样的内部和解者的勇敢行为和远见，他在考文垂大教堂被炸后立即呼吁和解而不是报复。

第四，只有当财政支持和项目成为一个更大的、由当地设计和领导的进程的一部分时，它们才会有所帮助。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必须增加资金，但也必须使其更加灵活。有效的协调需要灵活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况和寿命（而项目周期很少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对确保妇女和年轻人的充分参与尤为重要，因为她们往往被排斥在更广泛的建设和平进程之外并被边缘化。没有妇女和年轻人，和解永远不会成功。

第五，重要的是要记住，成立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是不够的，尽管经常有必要解决历史不公问题并确定过去发生了什么。不同的和解努力——无论是侧重于真相调查、赔偿、教育、和平新闻、处理过去的冤情还是书写共同的历史——都应该相互关联，并与冲突后社会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现实相联系。让我们不要忘记，和解是一个进程，而不仅仅是一个方案。

最后，我们绝不能认为和解只发生在暴力冲突之后。它需要随时随地发生——有时甚至作为实现和平的第一选项。在当今世界上，许多社会因宗教、政治、民族、种族或经济裂痕而严重分裂。我们的政治是分裂的。因此，我们需要减少偏见，挑战陈规定型观念，解决非人性化问题。我们需要支持日常的和平与和解。我们作为政治家、外交官、民间社会工作者、学者、媒体以及私营部门开展的活动应该产生信任、妥协及合作。

和解至关重要，因为如果个人和集体创伤得不到治愈，残留的冤情可能为后代之间的暴力循环自我延续提供基础。为了让分裂的社会愈合创伤并走到一起，我们需要制定战略，使我们能够就过去的冤情进行谈判，并让我们反思，记忆和情感是如何迫使过去变成现在的政治的。

设计有效的和解需要当地相关行为者，特别是妇女和年轻人的参与。作为国际社会成员，我们应该忠实地支持我们帮助设计的进程。

信仰可以成为和解的重要灵感，但操纵信仰也会导致进一步的分裂、仇恨或暴力。像所有其他行为者一样，信仰行为者需要根据他们的行为受到仔细检查，这就是研究、监测影响以及评估有助于实现的目标。

和解只有在背景深厚的情况下才能有效。不幸的是，有时可能需要振兴那些修复关系的传统。这就是地方行为者的知识至关重要之处，建立行为者和良好做法网络可以激励其他人。

在乔治·梅森大学冲突分析与解决学院及其新创立的玛丽·霍克和解中心，我们对当地主导的和解做法进行研究。我们特别注重内部和解者，促进学者和实践者之间的合作，研究信仰和土著叙事如何缓解冲突和修复社区关系。我们随时准备协助联合国完成其推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使命，特别是关于和平、正义和强有力机构的目标16。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厄泽尔代姆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埃尔曼女士发言。

**埃尔曼女士**（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邀请我今天上午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情况。

我来自索马里，一个在1991年毁灭性地崩溃，并至今仍在某种程度上陷于长期暴力无政府状态和战争的漩涡之中的国家。第一次和解尝试实际上是在1991年冲突最激烈的时候进行的。在战争初期，一份宣言制定出来，并得到了许多叛军领导人的支持。但是，由于并非所有叛乱领导人都签署，因此进程失败。此后，启动了许多设法结束冲突、建设和平的努力，直到今天。

作为一个长期冲突的国家的例子，索马里绝非独特。我国过去的努力从这样一种假设出发，即：政治和外交方法可直接嫁接于现有制度和态度之上，而无需首先为变革建立新的社会和经济基础，这种做法不幸是安理会及其成员国致力于解决的危机和冲突中的常态。因此，我们现在在主席国联合王国的主持下辩论建设和平周期中最难、而且可以说是最重要的部分即和解问题，使我感到鼓舞。

我想起发生在索马里加勒卡约市的忠于加尔穆杜格的部队和邦特兰部队之间的可怕冲突，我最近在那儿开展复员方案方面的一些工作。五万人流离失所，许多平民伤亡。无数武装到牙齿的民兵驻扎在该市的前线，而该市的地界实际说就用一根绳子划分。国际社会立即介入，以缓和紧张，将两地领导人带出索马里进行和谈。协议的签署受到海外的赞贺和国内媒体的响应。但领导人返回当天，再次爆发严重战斗，造成更多无辜者死亡。

当该族群的妇女、青年和宗教领袖被问及如何使前线青年放下武器时，回答很简单，就是与他们沟通。他们可以接触。如果提供和平的机会，损失最大的人定愿参加。我们知道，一个几乎只有政党参与，往往把选民排除在谈判之外的和解进程，成功的可能性极小。我们知道，要实现真正和解，该进程就必须接纳一种长期的全国性解决方案。最紧迫的任务通常是重建公众对机构，包括正式或非正式机构的信任。在我们今天希望解决的冲突中，这种信任令人堪忧地缺乏。

如果人们不再相信他们可以通过可信任的渠道、如政府机构解决问题，暴力将继续发生。和解是一个过程，不是单一事件，它不能是一个从输出到国外的进程。我每天亲眼目睹缺乏和解的法律框架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冲突各方的潜在叛离者对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脱离诸如青年党等团体后的命运无把握；意味着索马里政府机构严重腐败，不遵守国际人权法的影响；缺乏同时解除武装，改造部族民兵的平行努力；意味着持续不断的部族冲突、歧视和国内盛行的排斥和边缘化政治。这些问题遍布传统司法机制。此外，偏颇地对待妇女和歧视少数族裔导致长期不满。然而，多年来，医治创伤，促进前战斗人员、地方社群和部族间宽恕与和解的努力，一直由索马里非政府组织主导。

成功的建设和平与民族和解战略，必须有尽可能多的人口阶层参与。最重要的是，这种战略必须力求建立共识。世界各地由妇女领导的民间社会团体，有能力化解暴力的根本驱动因素，显著影响和解进程，却受到系统性排斥。在索马里、北爱尔兰、利比里亚、巴尔干，波斯尼亚和其他国家，妇女努力促进和平与和解的事例数不胜数。证据不言自明。

在庆祝第1325（2000）号决议20年之后，我敦促安理会不仅象征性地庆祝该文件，而且利用决议促进妇女参与，调整和解面临的挑战，并要求在和解战略的设计、执行和检测中，做到决策具有包容性并且顾及性别层面。这意味着，从一开始就征求妇女的意见，包括流离失所和残疾妇女；采取必要的步骤，增加参与调解、观察及和平协议谈判的女工作人员的人数；以及调整对所有人道主义工作者和妇女人权维护者的保护需求，她们因为参与这些进程而愈益成为目标，被失踪和绑架。尽管妇女，特别是年轻妇女在战争中成为受害者的可能性较大，但她们通过宣传和非正式网络创造出通往和平的路径，甚至借助新技术迅速形成大规模运动。

但是，缺乏财政援助来辅助调解工作与人权文化，是当今建设和平面临的最大挫折之一。除在索

马里埃尔曼和平与人权中心工作，主要致力于解除参与武装团体的青年男女的武装，促进其复原和重返社会外，我也非常荣幸地担任秘书长建设和平基金顾问，这证明秘书长致力于确保妇女特别是年轻妇女，及全球南方国家的妇女参与建设和平决策进程。在此过程中，通过这种工作，我们无数次听到脆弱国家和冲突中国家的人民直接呼吁为和解提供更多的支持。这是这些国家要求提供资金的原因。

我留给安理会成员一点想法和一项请求，请安理会主席和成员考虑与联合国大家庭内今天现有的机制合作。建设和平基金可在安理会的支持下，投入于我们今天讨论的国家的和解。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埃尔曼女士的有力通报。

我现在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英联邦、联合国和南亚事务国务大臣的身份发言。

首先，我谨代表联合王国政府并以安理会现任主席的身份，感谢各位参加我们的会议，就这个重要问题发表观点。我要特别感谢Özerdem先生和埃尔曼女士非常有力、感人和尖锐的发言。我也赞扬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的发言。他的话引起强烈共鸣，特别是他说，没有正义就没有和解，而没有真相就没有正义。那仍然应该是我们的主要目标和宗旨。

大家都承认，和解是持久和平的重要、甚至关键组成部分。原因何在？因为它可帮助民众和族群摆脱宿怨，不仅能解决现有冲突，而且可防止未来暴力。因此，联合王国现在并将继续坚决捍卫秘书长保持和平的构想，其中把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置于联合国在世界各地的重要工作的核心。

也因此，我们联合王国和其他国家一道，长期倡导信仰领袖发挥关键作用。今天，环顾世界，有逾四分之三的人直接表明信仰对他们很重要。毫无疑问，信仰领袖有能力以政府根本做不到的方式影响个人和社区。信仰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信仰领袖还可以扩大弱势群体的声音，通过调解和鼓励不同群体间的对话，来支持和解与建设和平。诚如Özerdem先生所说，我们也必须牢记冲突的原因，然后向前推进，做出改变。

联合王国和我本人作为人权事务大臣，经常注重寻求世界各地宗教和信仰领袖的见解，不仅寻求他们的支持，而且直接为政策和我们的工作提供信息，以找到切实可行，而且更重要的是，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我谨强调，这对于厘清内务也很重要。我们应当反思。这项工作从未完成。我们各国政府本身应不断调整。因此，今年，我们请特鲁罗主教审查我们对世界各地基督徒以及其它宗教少数群体成员遭受迫害采取的应对措施，这些群体包括穆斯林少数群体，包括艾哈迈迪派和什叶派穆斯林，以及巴哈伊教成员等等。

我们为在此过程中展现的诚实和透明度感到自豪，同样，我们感到自豪的是，我们把支持媒体自由的全球运动作为重要优先事项。托马斯·杰斐逊说过：“说话和写作的自由保障着我们的其它自由。”正因为如此，联合王国也在与我们在世界各地的伙伴一道努力寻求捍卫媒体自由，保护记者，他们在做非凡的工作，往往给自己带来巨大危险。我们支持这场运动，因为它与同宗教团体共同努力捍卫他们的宗教自由和保护受迫害者一样重要。

因此，作为政府，我们已经接受特鲁罗主教审查报告中提出的所有广泛建议，包括建立一个预警系统，从而加快我们应对暴行的速度。今天上午，我要对坐在安全理事会议席上的各位说，我们将寻求通过一项关于基督徒和不同信仰民众遭受迫害的安全理事会决议。我们希望，今天的辩论将打下基础，为今后关于这一重要优先事项的讨论提供参考。

关于司法，我们已经看到过渡期正义机制如何支持受迫害的人民，并为和平奠定基础。正如埃尔曼女士所说，这些机制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让社区所有成员，特别是妇女参与进来。联合王国始

终坚定主张让妇女参与解决冲突核心工作，并且会继续这样做，这不是马后炮，而是因为我们相信，妇女可以成为关键角色，确保实现和保持和平，并且建设国家和民族。同样重要的是应让妇女参与进来，从而确保儿童的想法得到有效代表。还需要让宗教、信仰、和社区领袖参与进来。确实，我们在寻求建立正义的时候，应该听取各种声音。这种包容性至关重要，但是，我们的努力当然必须针对有关国家量体裁衣。

厄泽尔代姆先生谈到了当地自主权问题。我们在世界上一些地区看到了这一点。冈比亚展示了一种可能的模式。它通过建立一个被人们视作具有独立性、协商性和包容性的真相、和解和赔偿委员会，赢得了公众的信任。同样，追究责任是长期和解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有罪不罚绝不应再成为默认选项。这就是为什么联合王国支持联合国的现有政策，反对赦免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灭绝种族罪或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包括反对在和平谈判当中这样做。

安全理事会可以做些什么呢？安理会可以与秘书长及其办公室合作，在调解和支持、政治特派团、建设和平委员会及其它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在各国从冲突和不稳定走向可持续和平与安全时，我们安全理事会的所有成员都负有特殊责任，以确保它们的努力取得成功。这意味着监测和解进程、指派妇女调解人、决定何时部署政治特派团，并确保妇女及其他被排斥群体在恢复与和解的各个阶段都占据核心位置。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应研究宗教领袖在这方面如何支持我们的努力。

最后，我感谢秘书长、我们的通报人和我们今天将听取其发言的所有与会者继续致力于支持公平、包容和有效的和解。归根结底，这是我们对所有遭受冲突痛苦者和继续受苦受难者应尽的责任，应当帮助他们克服分歧，返回自己的家园和社区。说到底，我们都需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建设持久和平。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我现在请希望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辛格·魏辛格先生**（多米尼加共和国）（*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很高兴你今天来到安全理事会。主席先生，我们感谢你主持本次辩论会，并感谢秘书长和各位通报人用他们的经验和建议为我们指明方向。

和解在建设和保持和平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使和解努力取得长期成功，我们必须把重建法治和加强国家机构，以及重建受冲突影响者对这些机构的信心作为优先事项。否则，就不可能保证安全，有罪不罚现象仍将是常规，经济活动将受到严重干扰。因此，我们坚持认为，消除有罪不罚的环境，包括起诉施暴者和向冲突受害者提供适当赔偿，对于恢复信任至关重要，来这样做。

对过去暴行的残酷记忆需要多年才能愈合。因此，为了播下和解的种子，有必要利用教育机构的潜力，它们可以成为体现社会凝聚力、和解和归属感的中心，推动理解和认识多样性。

我们必须进一步将和解努力引入联合国各机构的方案工作，因为这些机构拥有丰富经验和公正、中立等工具，可以为和解作贡献。在建设和平与和解进程中，我们经常关注冲突当事方，却忘记受冲突影响的各方。例如，妇女在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利比里亚、北爱尔兰和菲律宾的和解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只是其中几个例子。显然，妇女的参与有助于全面了解和解需要什么，增加成功的机会。

在此，我要感谢伊尔瓦德·埃尔曼女士的工作，并强调年轻人在这一领域所做的出色工作，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必须让青年，包括青年妇女，作为利益攸关方参与设计、实施和监测过渡期正义进程，包括寻求真相、赔偿与和解方案。

第二，青年是整合和平协议和进程中所作承诺的经纬，他们是历史记忆的天然传承者，这样，子孙后代可以汲取冲突的经验教训，从而确保长期可持续性。

第三，应当肯定青年在提高对国内冲突动态的认识和理解以及促进紧急重建边缘化社区之间的关系方面的关键作用。例如，“为未来对话”倡议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政府的主持下制定，并与联合国机构、塞尔维亚共和国和黑山共同实施，就是一个具体的项目例子，为不同社区和最高级别领导人与年轻人之间的建设性对话创造了更多空间。

在建设和平进程中，必须认真考虑年轻人的社会资本。我们呼吁各国政府、区域组织、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维持和平和政治特派团以及各利益攸关方让年轻人参加政治对话以及正式和非正式和解进程，以确保他们实现有条理、有系统的参与。

范沙尔克维克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很高兴看到你又同我们一道出席会议，我们再次感谢你昨晚慷慨招待我们——我们对此由衷感谢。

首先，我要感谢秘书长、厄泽尔代姆先生和埃尔曼女士就和解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中的作用这一重要议题所作的通报。南非确认并重视全国和解进程对于实现可持续和平、尤其是对于从冲突走向冲突后的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安全理事会知道，南非在废除了压迫性的种族隔离制度之后，经历了自己的和解进程。我们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其目的在于：对讲清在以往冲突过程中从事带有政治目的行为的人实行大赦，赦免其刑事与民事责任；让受害者有机会讲述他们所遭受的迫害；采取措施，为受害者提供赔偿；恢复侵害人权行为受害者的人格与公民尊严；以及提出建议，预防今后发生严重侵犯人权现象。许多南非人有机会作为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或实施者，出席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组织的一系列听证会。各国家机构、政党和组织以及工商界也被要求讲清它们各自在过去所起的作用。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一方面必须处理和解与未来问题，另一方面，必须查明与过去的事件有关的真相，并确保对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给予赔偿。在从种族隔离和压迫迈向宪政民主的历史性过程中，以及在这之后，都必须慎重考虑和平衡这些问题。妥协有时很痛苦，直面昔日压迫的真相也很痛苦。然而，对我们来说，基于我们的国情和历史，我们只能这样解决过去几十年的长期压迫并着手建设国家。

在从冲突后局势过渡的过程中采取和解措施，对于确保长期稳定至关重要。然而，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做法。过渡期正义进程必须符合过渡国家的具体情况。在我国，我们选择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以此种方式处理我们自己的历史与未来。刚结束冲突的国家必须找到自己的方式，根据它们本国的特殊情况，解决历史问题，开创未来新天地。

关于和平与正义的辩论仍在继续，每个国家都必须对其具体过渡进程发挥广泛的自主性，并找到自己的平衡方式，确定和平、正义与和解的先后次序。人权规范加强了过渡期正义，虽然这已经成为政治过渡期间的一种可接受的对策，但它们也将过渡进程打造成一个大体上属于法律的领域，问责范围往往较窄且以司法为重点。还必须考虑到，在政治上有必要促进替代性问责方式。单纯侧重于起诉可能会破坏过渡的稳定性。因此，需要探索过渡期正义的方方面面，包括真相委员会和对受害者的赔偿问题。此外，必须认识到社区正义机制或传统正义机制的价值和重要性，借此对当地解决冲突和消除创伤的做法进行调整，以处理严重侵害行为。同样重要的是，不仅在过渡期正义进程中，而且事先在谈判桌上，都要努力确保妇女和青年的代表权。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曾写道：

> “南非建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这在国际上是一次开创性实践，有可能对各国处理冲突的方式产生深远影响。国在家从压迫到民主的艰难过渡中，通常采取两种方式解决历史问题：把旧秩序领导人推上审判台，或者进行即决处置；或者掩盖昔日真相，无视暴力受害者的痛苦。南非结束种族隔离时，走出了第三条独特的道路。对曾经犯有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者，我们给予大赦，但这些人必须公开讲清他们所犯罪行的真相，而受害者也有难得的控诉机会，并有希望获得赔偿”。

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可以为营造一个有利于实现和解的环境发挥重要作用。持久和平不是仅仅通过签署和平协议就能实现的。它还要求采取综合做法，让广大多边体系积极参与，以解决和平与安全以及可持续发展需求。正如在维和行动中，不同局势要求以不同对策来处理冲突后的和解与发展问题。

在我们非洲大陆，非洲联盟为预防冲突、缔造和平、和平支助行动和干预，以及为建设和平和冲突后重建而建立了各种机制和架构，借此谋求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如果我们想要确保联合国系统、特别是安全理事会能够帮助受冲突肆虐的国家营造一个有利环境，并支持各国自主的和解进程和实现可持续和平与安全，就必须加强区域和全球机制之间的联系。

**奥泰比先生**（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首先欢迎你主持本次会议，并感谢你召开本次会议。我们也感谢提供概念说明（S/2019/871，附件）。我们还感谢秘书长的通报以及厄泽尔代姆先生和埃尔曼女士的发言。

在过去10年里，安全理事会召开了多次专题辩论会，探讨诸如调解等预防性外交工具对解决冲突的重要意义。今天，我们以和解为重点，而和解是实现各族群和平共处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冲突后局势下。成功实现和解有若干前提条件，秘书长和两位通报人在发言中有详细阐述。安全理事会必须更加重视这一议题，以防止重陷冲突。要做到这一点，不仅应当通过就此问题举行讨论，还应当采取措施，确保在实地加以落实。

在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的全面做法中，和解是最重要的内容和环节之一，它是确保可持续和平的一项关键重要因素。和解的成功取决于若干其他伴生因素，包括追究责任和过渡期间正义，即确保犯罪者不逍遥法外，也确保尊重人权和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并确保复原、重新融入社会和解除武装。对受害者，我们必须提供必要支助，以确保他们完全康复。我们重申各国必须掌握一切和解进程的自主权。我们必须制订综合性和解战略，并辅以有关各方之间的建立信任措施。对话需要牺牲、妥协和灵活性，需要告别过去、治愈创伤，并以乐观态度向前迈进，还要有严肃认真的政治意愿。

联合国掌握着很多工具，使之能够在和解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维和行动是最重要的工具之一，自1948年以来一直在发挥这样一种至关重要的作用。维和行动在一些国家取得了成功，在另一些国家则遭遇挑战。此外，秘书长的各位特使和特别代表有责任为开启对话、最终成功实现和解创造条件。

我们还必须强调建设和平委员会的作用。该委员会——尤其是国别小组——往往通过为建设和平和冲突后恢复提供咨询和综合性战略建议，在此类进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我们必须通过各种方式，特别是通过委员会与建设和平基金的密切合作，帮助确保早期恢复活动资金来源的可靠性以及中长期财政资源的可持续性。我们不应忘记，一些国家在为和解奠定基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联合国应当与这些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并与支持具体和解进程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合作，这一点非常重要。

和解必须包容各方。我们绝不能在谈判中忽视妇女、青年、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的需求和关

切。我们还必须牢记，妇女在建设和平的各个阶段都能发挥重要作用，并能在提出和执行和解战略方面做出贡献。此外，我们必须认识到，和解模式不止一种。相反，每个局势都有其特点，具体取决于所涉冲突的性质以及引发冲突的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等层面因素。

最后，我们重申，和解是一个复杂的长期进程。然而，这一进程如果取得成功，就能结束流血，防止进一步的破坏和损失。此类和解进程需要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持续提供支持，需要民间社会和媒体的参与。我们强调，应制定旨在提高认识的媒体战略，鼓励社会成员化解冲突，实现和平共处。此种战略在当今世界不可或缺。在讨论和解进程之际，我们期待安全理事会议程上的所有冲突多发地区——叙利亚、也门、阿富汗及其他冲突地区——签署民族和解与和平协议，结束不幸的冲突阶段，为重建带来希望，为建设一个我们各国人民共享的更美好未来带来希望。

**张军先生**（中国）：中方欢迎艾哈迈德外交国务大臣来纽约主持会议。感谢古特雷斯秘书长的通报。我们认真听取了厄泽尔代姆教授和埃尔曼女士的发言。

安理会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职责，在各方努力及国际社会支持下，联合国及安理会为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了不懈努力，取得了积极成果。同时，也有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其中包括如何让和平更加可持续、更加稳固。

实现和解是结束冲突、促进持久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条件。有关当事方如果不能捐弃前嫌，释解旧怨，和平的局势将难以真正维持，冲突的火焰有可能重新点燃。实现国家或族群和解，需要当事各方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的支持与协助。我主要谈以下几点：

第一，尊重当事国主权是实现和解的首要前提。各国具体国情不同，法治和文化各异，没有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和解之路”。因此，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帮助应以尊重当事国主权和主导权为基础，充分尊重当事国的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支持当事国以符合自身国情方式推进和解进程，避免喧宾夺主，将外部方案强加于人。任何人无权自诩为“法官”或“教师爷”。

第二，对话协商是实现和解的唯一途径。当前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层出不穷，中方主张通过对话谈判，以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难点问题。当事各方要坚持通过坦诚深入的对话沟通，增进互信，减少猜疑，反对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应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以合作促安全，尊重和照顾彼此合理关切，实现和解与和平。

第三，斡旋调解是实现和解的重要方法。要充分用好《联合国宪章》第六章，发挥好联合国在斡旋、调解等方面的作用。应维护安理会权威，并充分发挥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作用，支持通过对话、谈判、调解、斡旋等和平手段解决争端的努力。国际社会应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为妥善解决地区冲突发挥劝和促谈的建设性作用，促进民族和解，使热点问题不断降温乃至最终解决。联合国各机构应根据授权各司其职，加强协调，形成合力。

第四，可持续发展是实现和解的根本之策。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古特雷斯秘书长多次提到，实现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是解决冲突根源的有效方式。大部分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根源在于贫困和发展不足，出路在于实现可持续发展。应坚持发展与和平并重，以发展促和平，以和平促发展，标本兼治解决冲突根源，通过增强发展能力为实现可持续和解与和平奠定基础。

习近平主席说：“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我们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中国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在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当今世界，作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和安

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将一如既往站在和平与正义的一边，积极探索和践行中国特色热点问题解决之道，为有关当事方促进和解、积累互信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

**霍伊斯根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和解这个主题对德国极为重要。这也与我国的历史有关。厄泽尔代姆先生稍稍提及了我国的历史，他谈到了今天考文垂与德累斯顿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不仅是因为我国的历史，而且还因为我们深信，和解是冲突周期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在德国，我们刚刚公布了一项支持处理历史问题以及实现和解、特别是过渡期正义的战略。

我愿重申秘书长在其通报一开始就提及的一个事实，即，和解是一个重要的预防机制。和解对于进入冲突后阶段的国家而言是关键的一步。只有成功地实现包容性和解，才能确保长久和平。

再次引用秘书长和你艾哈迈德勋爵的话，没有正义就没有和解，没有真相就没有正义。绝对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在争取和解的努力中务必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根据刑法追究那些对暴行和侵犯人权行为负有个人责任的人的责任，是维持和平的关键先决条件。正如秘书长所说，我们必须打破有罪不罚的循环。这就是为什么在大会高级别周期间，德国呼吁合作伙伴共同努力，建立一个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联盟，以期为国际刑事司法制度注入新的动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支持协助调查和起诉罪行的国际机制，例如叙利亚问题国际公正独立机制、缅甸问题独立调查机制和促进对达伊沙所犯罪行追究责任的联合国调查组（联合国调查组）。

我们以前曾就叙利亚问题进行过这样的讨论。德国坚信，必须调查叙利亚冲突期间各方所犯下的罪行和暴行，并将罪犯绳之以法。这是实现和解的唯一途径。因此，德国检察官将继续调查在叙利亚可能犯下的战争罪行，我们将继续支持叙利亚问题国际公正独立机制。我借此机会再次呼吁大家在第五委员会支持该机制的预算。我们还欢迎联合国调查组在伊拉克的工作，欢迎其重要任务的延长。我们在财政上并通过借调支持联合国调查组，并期待着扩大联合国调查组与我们检察官之间的富有成效的交流。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某些因素对于和解的成功至关重要。基于所有的发言，我认为我们大家都同意，我们首先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定制本地解决方案。这种解决方案被厄泽尔代姆先生称为量身定做的进程，被我们的同事奥泰比先生称为独特的方法。厄泽尔代姆先生还提到了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具体例子，即莫斯塔尔桥。重建后的这座桥看上去十分漂亮，可当地社区却仍然没有真正和解。因此，必须将民间社会和地方组织包括进来。在设计和实施和解方法方面，当地民众必须掌握主动权。德国试图在具体事例中做到这一点。例如，我们支持马里的包容性过渡期正义进程。

安理会一次又一次地讨论国家主权问题。是的，国家主权应该得到尊重，但正如我们的中国同事所说，要在《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规定的范围内。只有每个人，特别是边缘化群体和民间社会都包括进来，并促进和保护所有人的人权，才能保证国家自主权。

实现妇女参与是贯穿几乎所有发言的一个主题。德国认为，在整个和解进程中反映性别平等视角至关重要。妇女的领导和参与对于过渡期正义的成功是必要的。我们一直这么说，但我们必须付诸实施。不能像在阿富汗问题的谈判中那样，一方只有男性代表。我们必须有妇女参与，我认为我们都应该承诺不参加一方只有男性代表的任何谈判。我们德国代表团有一条规定，没有妇女参与，任何小组都不能开展活动。我认为这也应该适用于谈判。

关于国家解决办法，地方一级的和解必须作为更广泛的国家谈判的一部分。社会和解政策需要包括长期的全国性解决方案。埃尔曼女士举了她自己国家的例子，说明每个人都有确定性，信任政府机构，有善政，没有腐败，是多么重要。

我们为我们认为是成功的努力提供具体支持。我仔细听了Van Shalkwyk先生关于南非的讲话。安全理事会访问了哥伦比亚，在那里找到了非常好的解决办法，包括特别和平法院、真相委员会和搜寻失踪人员的单位，我们对此表示支持。我们还通过和平与发展顾问支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建立国家预防冲突能力联合方案，这些顾问证明非常擅长支持和解进程。

关于我们对联合国工具箱的支持，我们希望加强安全理事会对预防冲突的关注。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更经常地关注新出现的冲突，并认为必须更经常地将和解与调解能力纳入特派团的任务规定。我们还认为，正如埃尔曼女士所提到的那样，建设和平委员会在冲突局势和预防努力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还提供了一个合作、交流和分享经验教训的平台。因此，安理会应更频繁地对委员会加以利用。

我的最后一点是，德国是建设和平基金的最大捐助者，我们为此感到自豪，并邀请其他国家加入我们的行列，并作出更大贡献。

**贝克斯廷·德布伊茨沃夫先生**（比利时）（*以法语发言*）：我感谢举行这次辩论。请允许我对秘书长和通报者的发言表示感谢。

正如秘书长引用德斯蒙德·图图的话所说，

> “没有现成的和解路线图。在持续暴力事件之后，治愈社会的创伤和分裂没有简单的药方，没有捷径可走。”

面对不容忍现象，要建立信任，创造促进相互尊重和具有复原力的环境，是一项极其困难的挑战。然而，它对于促进持久和平和恢复社会结构来说至关重要。审视痛苦的过去，承认它，理解它，最重要的是一起超越它，是确保它不会再次发生的最好方法。我们认为，过渡期正义进程可以对此作出贡献。

和解是一个在不同时期影响到我们所有人的问题。我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开始了和解进程，所产生的影响延续至今。和解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没有单一的公式。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和解确实是可能的。

每个社会都必须找到自己的和解之路。这涉及一个非常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必须对受害者的痛苦和遭遇作出回应，必须了解那些侵犯他人权利的人的动机，必须使分裂的社区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并力求找到通往正义、真相和最终实现和平之路。可以采取一系列短期、中期和长期措施来实现这一目标，每个刚刚摆脱冲突的国家都必须努力找到预防新冲突的适当措施组合。因为，正如今天上午许多人所说的那样，和解是实现预防的最佳途径。有些因素可以增加和解进程的成功机会。让我提及其中三个。

首先，必须采取以受害者为中心的和解方法。受害者往往要求承认他们所遭受的经历，甚至是某种形式的赔偿；这些要素可以补充刑事司法系统的行动。这种做法必须考虑到冲突的地方和人的层面。例如，作为哥伦比亚和平协议的一部分，采取了大量地方和解举措，如梅塔的“和解影院”和卡克塔省的“以划桨促和平”项目，该项目将受害者和前战斗人员聚集在一起参加漂流比赛。

这些举措正在帮助恢复以前无法实现的社会关系。然后，还有包容各方的进程。正如在我前面发言的其他人所说，妇女、青年、儿童、难民、流离失所者、少数群体和其他弱势群体都可能在冲突期间有过特殊的经历，因而在和解进程中可能有具体的需求。必须听取并考虑他们的经验，他们的参与不应仅仅是象征性的。

第三，必须恢复公民对其机构的信任。在这方面，必须解决某些人对警察、司法机构或其他公共机构可能产生的不安全感和不信任。安全理事会早在2004年10月6日通过的一项主席声明（S/PRST/2004/34）中就充分意识到过渡时期正义有助

于和解努力，并提请注意过渡时期可以考虑的各种正义机制，包括国际、国家和混合刑事法庭以及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它也包括在若干和平行动的任务中促进各种形式的过渡时期司法措施，以支持国家能力。在这方面，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的新的综合标准现在也同样侧重于过渡时期正义，这是一个积极的事实。和平行动的撤出战略也应如此。

根据这些不同的经验，我们可以进行更广泛的审查，以便确定指导安全理事会今后在这一领域作出决定的一些关键原则。比利时认为，在情况允许时，过渡时期正义是安理会应继续视为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任务组成部分的一个工具。

**波利扬斯基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感谢秘书长和其他通报者对和解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作用所作的评估。

持久的民族和解确实是成功解决冲突和防止重新陷入冲突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只有在冲突各方达成能够普遍接受的长期解决办法的情况下，才能达成和平协议并实现冲突后的持久重建与发展。一般而言，解决国内冲突的关键，始终而且也仅仅是全国范围的全面对话。实践表明，无论有关国家如何，这是确保强有力、持久与可行的解决办法的唯一途径。正如提交我们审议的概念说明（S/2019/871，附件）正确指出的那样，在冲突后建设和平期间，包括在民族和解方面，政府和社会都必须承认其国家对持久和平的主导权。这一做法载入2016年关于审查建设和平架构的两项决议（第2282（2016）号决议和大会第70/262号决议）。具体而言，这意味着国家对维护其人民的安全负有首要责任，而社会各阶层都必须确认其支持和平进程的责任。

国际社会，包括各国、其联盟和联合国本身的行动，应旨在协助有关国家内各行为体的和平努力。尤其是，联合国拥有一切必要工具，可通过秘书长及其特使和特别代表的斡旋、以及维持和平特派团、特别政治特派团和国家工作队的工作，帮助各国实现民族和解。然而，我们认为，联合国的努力应侧重于与各国政府官方的合作。只有在国家当局发挥协调作用的情况下，才能在实地与各行为体进行互动。此外，国际社会在确保民族和解方面提供的援助应当非政治化，不能成为从外部强加现成解决办法的途径。任何企图基于自己的利益而支持冲突一方的做法只会加深分歧，并阻碍恢复和真正的和解。

关于这一议题，我们要更详细地阐述国际司法的作用，并在和解的背景下追究施害者的责任。正义与和解当然并非总是齐头并进。国际司法机构的运作常常导致社会内部分歧进一步升级。目前，这是世界各地若干国家的一个紧迫问题。我们看到，在联合国这里的国际司法机构的帮助下，正在与前对手解决政治上的问题。

我们坚信，在每一个个案中，都必须努力在恢复和平与正义的利益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无论这样做有多么困难。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应努力加强国家司法机构。然而，我们认为，在审判期间查明事实，起诉应负责任者，以及释放无罪者，确实会有助于实现局势正常化并平息冲突各方之间的敌意和敌对情绪。但是，只有在这些进程是公正和非政治化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令人遗憾的是，国际司法机制往往表现出明显的双重标准。例如，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的工作，从对巴尔干和解进程的贡献角度来看，很难说是一个成功的事例。在审理涉及塞族被告人的案件时普遍存在不合理的起诉偏见，而在揭露科索沃阿族战地指挥官犯下的无数罪恶方面又缺乏真正的承诺，更使这种偏见进一步复杂化。显然，将某种罪行归咎于一国人民、政府和政体的企图在前南斯拉夫领土上激起紧张关系和互不信任，使该区域长期存在的问题和族裔冲突死灰复燃。因此，不可能促进和解。

我们必须指出，国际刑事法院也走了类似的道路。安全理事会移交给刑事法院的案件正在以不符

合和解目标的方式审理，这就加剧交战各方之间的分歧，这一点在国际刑事法院审理利比亚案件过程中尤为明显。

如果从总体上审视国际法庭的活动，我们可以看到，国际法庭与冲突后社会和解进程之间的关系是极其间接的。卢旺达在这方面的经验是有益的。在卢旺达国家一级建立了半传统的“加卡卡法庭”形式的地方司法制度，这在冲突后和解努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由于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效率低下，该法庭只审理涉及1994年灭绝种族行为主要组织者的案件。在实践中，加卡卡法院的工作不仅仅是伸张正义，还包括确保民众尽可能广泛地参与法院活动，使普通民众能够公开审理案件并做出公平裁决，从而促进社会内部和解。合作和积极参与法庭听审的概念已经成为公众意识的一部分。加卡卡法院在10年内审理了大约200万起案件，费用比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在成立20年中处理不足100起案件的花费低45倍，这一事实就是加卡卡法院有效性的证明。加卡卡法院的工作结果证明了寻求非洲方案解决非洲问题的有效性。

最后，关于我所说的，我想指出，我们认为，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在冲突后和解方面的工作不应被视为定论，它可能造成的伤害可能会远远超过它可能带来的价值。

**阿多姆先生**（科特迪瓦）（*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科特迪瓦欢迎就和解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问题举行本次公开辩论，并欢迎你今天出席会议，这反映了贵国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科特迪瓦还感谢秘书长和通报者所作的翔实通报以及提出的相关建议。

教科文组织的《组织法》指出，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须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教科文组织非常珍视这句话，它敦促我们动员集体意识，防止冲突，同时，它也含蓄地强调了和解在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和解应在整个和平连续体中发挥作用，并成为从预防、管理到巩固危机后稳定的各个不同阶段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必须让冲突各方参与进来，确保他们能够克服困难和宽恕，思考那些没有它们就不可能有持久和平的价值观。

在科特迪瓦近代史上，一些无疑是痛苦的事件带给了我们很多经验教训。我们尤其认识到，和解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既需要冲突各方有寻求和平的意愿，也需要包括区域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持续支持。在这方面，在国家一级，和解必须是一切危机后和建设和平战略的支柱，必须将它纳入一种全面的做法，顾及冲突根源，并让国内各种政治和社会行为体无一例外地参与进来。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全国性的宣泄过程，和解必须使犯罪的施害者及其受害者的声音能够被倾听，因为必须鼓励他们相互原谅，并同意将他们的分歧和创伤转化为一种新的社会契约。

考虑到这些要求，科特迪瓦2011年的选举后危机一结束，我国政府就成立了一个对话、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负责恢复国内所有社会政治和族裔成员之间的对话，并促进他们和平共处。在2011年至2013年的两年任期内，该委员会举行了近7万次受害者听证会和80次公开听证会。在其随后提出的建议中，该委员会审议了有效适用农村土地法、改进对妇女地位相关问题的审议、缩小地区差距、建立共和国军队以及设立全国纪念日、宽恕日和对话日等问题。2015年5月，全国和解和受害者赔偿委员会接管了该委员会的工作，并负责查明和赔偿选举后危机的受害者。

我们认识到和解应该是危机后和建设和平战略的核心，同时和解也必须具有包容性，并确保为妇女和青年发出声音提供重要空间，正如埃尔曼女士刚才提醒我们的那样，他们是冲突局势中暴力行为的主要受害者，但也可以是和平与稳定的设计师。过渡期正义和实行问责制原则对和解也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包括大规模屠杀和针对妇女儿童的性暴力在内的严重侵犯人权的案件中。在这方面，国际社

会和发展伙伴的支持对于加强过渡期司法机构以及确保战争受害者获得赔偿、心理保健和重返社会至关重要。我要强调建设和平基金在这方面的重要作用，它是我们在恢复和平后努力巩固和平的另一个工具。

要想让和解达到预期效果，就必须考虑到族裔间联盟与和平契约等社会和文化监管机制、宗教协会的工作，以及学校和国家电台发挥的领导作用，特别是在科特迪瓦，因为它们能够保持社会平衡，维护社会各界的和平共存。为进一步巩固两个冲突后和解委员会取得的成果，科特迪瓦成立了全国传统国王和酋长院，有效应对了和解的要求，努力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建立和谐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和社会凝聚力。

除了国内舞台，国家间的冲突也需要和解。在这方面，交战方的和解与争取和平的意愿可得益于区域组织的支持，特别是那些负责促进国家行为体之间对话与合作的区域组织。

最后，我国代表团敦促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继续对当前的各种民族和国家间和解进程给予多方面的支持，以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

**乌加雷利先生**（秘鲁）（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欢迎你出席今天的会议。我们还赞扬秘书长和我们的通报者讨论如何最佳地巩固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中的和解工作。

和解是一个非常复杂且多层面的概念，针对个别冲突局势的具体情况实行和解可有助于恢复和平共处与合作的可能性，并且超越单纯的停火概念。必须将和解视为一个进程，是更加雄心勃勃和全面战略的一部分，以旨在查明和解决冲突的政治、社会、法律和经济根源，以防止冲突再次发生。因此，我们赞同这样的观点，即：没有适用于所有冲突情况的单一不变的模式。不过，我们认为，它们总是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它们都是自愿的。它们都认识到，这一进程必须是渐进的和多层面的，恢复信任和社会各阶层的参与对于必须实现的政治、社会和历史关系转型至关重要。在我们看来，宗教、政治、社会、文化和媒体领袖等现在可以发挥核心作用，创造有利于启动和解政治的环境，执行和解政治，同时特别促进妇女和青年的参与。

经验告诉我们，有些行动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例如，组建和平、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之举清楚地表明，从自我反思的角度深入了解事实很重要，有助于理解所发生的事情，并为接受和原谅铺平道路。同样，围绕事件开展工作并采取象征性姿态尤其可贵，同时要根据第2474（2019）号决议制定全面政策，处理对所发生事件的记忆，包括采取行动查明冲突期间失踪人员的下落。

前战斗人员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也是和解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可以消除对和平的潜在威胁。

在涉及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等暴行罪的案件中，必须伸张正义，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并对受害者进行各种形式的确认和赔偿，唯有如此，和解才会可信。

当这一情况没有出现时，国际社会，包括安全理事会，必须承担起责任，设立政治特派团、特设法庭，将局势移交国际刑事法院，以确保严重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事件的肇事者因其所犯罪行而受到追究。

在这方面，我们愿同德国代表一道强调协助调查和起诉自2011年3月以来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犯下国际法所规定最严重罪行者的国际公正独立机制以及促进对达伊沙/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所犯罪行追究责任的联合国调查组等过渡期共识机制的价值。

最后，我谨强调预防性外交在消除冲突根源方面，尤其是对于防止侵犯人权的重要性。这种活动可避免未来建立和解进程的必要性。为此，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以及邻国必须更积极地参与，以便在暴力爆发之前将各方聚集在一起。

**德里维埃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和其他两位发言者的通报。我还感谢主席国联合王国召开本次辩论会。

法国支持秘书长大力推动和平外交。联合国必须加大投入，在上游预防冲突，在下游建设持久和平。必须加强联合国在调解、预警及支助和解等方面的能力，包括增强建设和平基金的权能。2020年建设和平架构审查应当为更进一步开展工作提供机会。

伸张正义和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是实现公平与持久和解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没有正义就不会有和平。在冲突后伸张正义至关重要，在发生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的情况下尤其是如此。目的是确保为受害者伸冤并打破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因此，法国深信，国际刑事法院遵守互补原则，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

法国还欢迎促进对达伊沙/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所犯罪行追究责任的联合国调查组作出努力，以收集达伊沙所犯罪行的证据。我们还将继续为协助调查和起诉自2011年3月以来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犯下国际法所规定最严重罪行者的国际公正独立机制提供充分的政治和财政支持。

要想防止暴行复发，和解进程就必须特别重视记忆和受害者。我们欢迎诸如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和国际刑事法庭等过渡期正义机制的活动，这些机制为有关区域的和解与和平作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现在必须保护它们的遗产，更广泛而言，必须保护它们在记忆和历史事实记录方面所做的工作。

必须教育青年，以防分裂重现，助长暴力。这不仅是各国政府和地方行为体的责任，也是安全理事会的责任。在这方面，我们深感不安地注意到，在卢旺达某些地区，有人仍然否认针对图西族的灭绝种族事件；在前南斯拉夫，有人美化战犯。这是过渡期正义和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斗争必须系统性地解决记忆问题的另一个原因。

保护幸存者的权利，包括通过建立赔偿机制这样做，至关重要。法国全力支持国际刑事法院援助受害者信托基金。在缺乏司法机构或司法机构过于软弱的地方，必须提供医疗、心理和社会支助，以推动幸存者重返社会。这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纳迪亚·穆拉德和丹尼斯·穆克韦格创立的援助冲突中性暴力幸存者国际基金所设的目标。

在这方面，建设和平必须尽早纳入和解目标。我们必须促进尽可能包容各方的和解进程。和解进程必须让妇女、青年、民间社会行为体以及社区和宗教领袖参与。我想重点谈谈妇女的作用，这是法国的优先事项，也是安全理事会的优先事项，安理会有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让妇女参与的和平进程更有效，也更加持久。我们欢迎建设和平基金的努力，其三分之一的项目纳入了这种考量。

还有必要尽快调查会助长仇恨周而复始的事件。例如，在萨赫勒，恐怖分子正在为部族间冲突推波助澜。在这方面，我们欢迎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努力调查侵犯人权事件并发起和解倡议。防止灭绝种族罪行问题特别顾问和联合国马里人权状况独立专家对马里的访问也颇有助益。这种努力应当继续，与此同时，支持国家预防冲突与实现和解战略也至关重要，因为首先应由地方当局以中立和不偏不倚的方式确保其各社区共存。

我谨强调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在中非共和国为促进签署地方和平与和解协议所做的出色工作，这为2月6日签署全面和平协议铺平了道路。自那时以来，根据该协议设立的地方监测委员会在确保和平进程的真正所有权方面一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和解对于建设持久和平至关重要。因此，必须把和解系统性地纳入安全理事会所设的目标。

**斯伊哈伯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与其他人一道热烈欢迎你参加我们今天的会议。我们感谢联合王国召开本次关于和解的公开辩论会。我们也感谢秘书长阿尔

帕斯兰·厄泽尔德姆先生和伊尔瓦德·埃尔曼女士所作的非常深刻的通报。

印度尼西亚赞同菲律宾代表将于今天晚些时候以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名义作的发言。

冲突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并不总是容易解决。和解使受冲突影响的社会得以重建信任、信心和关系，治愈冲突的创伤，帮助社会走向和平的未来。和解与建设和平和发展相结合，使冲突不再发生，确保持久和平。

印度尼西亚在21世纪初亲身经历过通过促进成功和解来解决安汶、波索和亚齐的族裔冲突。我们基于自己的经验，分享以下几点。

首先，国家自主权和包容性是实现持久和解的关键。和解要发挥作用，就必须由国家驱动，不能从外部强加。持久和解也需要社会各阶层共同参与。在这方面，我要重复秘书长先前提到的事实，即和解必须来自内部，要有社会各阶层的充分参与。因此，必须让冲突各方以及民间社会组织、族群和宗教领袖、妇女和青年参与进来。特别是妇女，事实证明她们是和解中的重要力量。我们自己的经验表明，妇女在以各种方式推进基层和解方面发挥了广泛的作用。印度尼西亚坚定支持加大妇女在和解以及在整个和平进程中的参与力度。

第二，和解要扎根，就需要有利的环境。首先，必须消除冲突的根源；必须满足紧急人道主义需求；必须恢复法治和司法系统，以确保人人享有正义；必须建立民主，为公开和真正的对话提供一个平台。与此同时，必须加快经济发展，以便人民能够直接感受到和平红利。只有通过这一努力，我们才能在保持和平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建立紧密联系。

第三，国际社会必须为和解提供必要的支持。虽然和解进程由国家推动，但国际社会的作用不可或缺。联合国必须通过其维和行动、特别政治任务和建设和平委员会，继续努力促进对话，创造有利于和解的条件。为了帮助冲突后国家重建经济，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必须调动资金和技术支持。在这方面，继续支持建设和平基金至关重要。

印度尼西亚方面一直积极支持建设和平与和解努力，包括在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框架内推行能力建设方案。在区域一级，印度尼西亚发起建立了东盟和平与和解研究所，该研究所设在雅加达，促进区域内外的和平与和解能力建设以及经验和最佳做法分享。

最后，印度尼西亚随时可以进一步分享和解方面的经验。我们也承诺继续帮助冲突后国家促进和解、建设和平和可持续和平。

**恩东·姆巴先生**（赤道几内亚）（*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谨欢迎英联邦、联合国和南亚事务国务大臣塔里克·马哈茂德·艾哈迈德勋爵阁下，并感谢主席国联合王国提出召开本次重要辩论会的出色倡议。我也要感谢秘书长和我们今天的其他通报人阿尔帕斯兰·厄泽尔德姆先生和伊尔瓦德·埃尔曼女士所作的富有启发性的全面发言。我们也要赞扬建设和平委员会为冲突后局势提供支持并帮助预防冲突。

我国代表团认为，在预防和解决冲突的各种方法中，促进社会和解是预防和解决冲突的战略手段。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利用各种政治工具来促进社会和解举措，例如建立和平委员会、促进对话、通过媒体提高认识以及在青年和妇女中推进和解。

正因为如此，在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总统特奥多罗·奥比昂·恩圭马·姆巴索戈先生阁下的成功倡议下，我国政府定期在国内所有已建立并得到承认的政党之间举行全国对话。对话是所有政治利益攸关方就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的多个方面进行讨论和互动的大论坛。这些对话巩固赤道几内亚共和国过去40年来普遍存在的紧张局势缓解和民族和谐的持续气氛，从而保障了基础设施、教育、卫生、能源和供水等领域的参与性和可持续发展。

这些问题在我国定期举行的经济会议上也得到讨论。

和平委员会是动员地方领袖和社区成员的基层组织，设立和平委员会有助于防止暴力爆发并促进宽容。它们的工作可能涉及一系列任务，如辟除谣言和夸张言辞，倡导非暴力的冲突解决办法，通过社区方案提供和平教育，以及充当冲突群体的调解人。在满足要求的适当条件下，和平委员会可以促进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并与反对党接触，以减少暴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宽容。因此，和平委员会已成为体制加强工作的协调中心，这些工作旨在开展能力建设并在实践和程序中确保一定程度的统一性。

最后，关于青年与和平与安全的第2419（2018）号决议提醒我们，青年的参与是推进国家建设和平进程和目标，同时确保顾及社会各阶层需求的关键。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必须考虑让青年积极参与和融入建设和平的所有方面。

促进年轻人之间的和解可以作为加强维持和平的一种战略方式。年轻人因自己或家人亲身经历的创伤而留下心理伤痕，滋生了对社区的怨恨和不信任。与年轻人达成和解，有助于恢复和重建社会关系。

同样，努力确保对年轻人开展公共教育，如开展媒体宣传运动，有助于消除极端分子散布的谣言和宣传，这些谣言和宣传加剧了社会和政治紧张局势。同样重要的是，必须注意妇女通过和解而在建设和平和维持和平中可以发挥的作用。

最后，我要指出，我们愿向埃塞俄比亚总理、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比·艾哈迈德先生表示他当之无愧的敬意，感谢他努力与厄立特里亚实行和解。他们在非洲之角建立了平息紧张局势的新动力。

**诺尔曼·查勒特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很高兴今天在这里看到你和我们在一起。我感谢通报者提出了非常深刻和具体的建议。和往常一样，我们很高兴看到秘书长出席会议。

联合国的诞生向一个被战争所撕裂的世界传递了一个强有力的和平信息。自1945年以来，本组织一直是世界上开展对话、辩论、或许最重要的也是达成和解最重要的多边论坛。这些是美国全力支持的举措。我们寻求为受害者伸张正义，追究那些应对暴行负责的人的责任。我们制定方案，提供技术支持，提高最弱势群体的声音，并为这些努力提供大量资金。我们还肯定各位联合国特别代表和特使以及联合国实况调查团开展的重要工作，他们促使受冲突蹂躏的社区达成更加充分的和解。我们同今天上午其他人一样，也肯定妇女发挥了作用，推动在和平协议中达成持久和解。

在我们这个时代，本组织有许多具体的机会来推动实现和解，今天上午，我只想谈其中几个机会。

在叙利亚，美国坚信，叙利亚问题国际公正和独立机制在收集关于该国境内犯下严重罪行的信息方面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赞扬过去一年该机制取得了进展，我们感到自豪的是，今年我们又提供了200万美元，并支持从联合国经常预算中为该机制供资的努力。

我们尊重叙利亚民间社会领导人的抗逆力，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记录侵犯人权行为，并保护暴行受害者。他们的工作有助于促进叙利亚的正义和问责制，这两者对真正解决冲突都至关重要。

在缅甸，处理安全部队虐待少数民族的问题对于有意义的和解至关重要。为此，我们欢迎联合国缅甸问题独立国际实况调查团记录2011年以来在缅甸犯下的侵犯人权行为，包括对若开邦罗辛亚人和克钦邦、掸邦及全国其他地方的其他弱势群体的侵犯人权行为。我还要重申，我们坚决支持缅甸问题独立调查机制。与在叙利亚一样，美国深切感谢缅甸民间社会组织在极其危险的条件下，继续记录侵犯人权行为，并追究暴行肇事者的责任。

在伊拉克，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追究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伊斯兰国）对所有伊拉克人犯下的暴行的责任。伊拉克社会的任何部分，包括不同信仰和族群的成员，都未能逃脱伊斯兰国的恐怖。为了启动一个愈合与和解的进程，我们必须对各种事件作平衡和真实的描述。美国在伊拉克政府的支持下，并于今年9月再次得到安全理事会的一致认可，继续大力支持促进对达伊沙/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所犯罪行追究责任的联合国调查组收集、储存和保存伊斯兰国暴行的证据，这些暴行可能构成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同样在伊拉克，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也在发挥关键作用，与伊拉克政府和人民合作，推进包容性政治对话，以实现国家和族群层面的和解。

在南苏丹，联合国特派团在那里参与了和平谈判，并正在增强社区开展类似对话的能力，其中一些对话促成在地方一级解决了冲突。但是，虽然这些努力有助于实现某种和解，但如果没有政府主导的更大努力来治愈五年战争造成的创伤，这些努力是不够的。

联合国具有在世界各地促成和平与和解的独特能力，美国认为，联合国可以通过调解、问责和为受害者伸张正义，适当利用这一能力。安理会和联合国可以指望美国继续支持这些努力，为人类繁荣而开展和解工作，正是我们的最高使命。

**弗罗内茨卡女士**（波兰）（*以英语发言*）：首先，我感谢秘书长以及今天的通报者Özerdem先生和Elman女士非常翔实的发言。主席先生，我还要感谢主席国英国和你本人组织了本次公开辩论会，讨论建设和平和维持和平的最关键要素之一。

虽然我们既没有和解的共同定义，也没有各国可以直接实施的普遍模式，但我们必须就这一复杂进程的每个方面交换意见。对和解进程所有不同模式和看法的共同点应该是以幸存者为中心的做法。和解进程本身和优先事项必须由受影响的社区来确定。

如果某些弱势群体或少数群体----包括流离失所者、宗教少数群体成员、妇女、青年和残疾人——受到歧视或被边缘化，民族和解和建设和平就无法奏效。在这方面，宗教领袖必须与社区携手合作，发挥他们的作用。

宗教和信仰往往被视为冲突的一个因素，但我们不应忘记，它也可以是解决办法的一部分。我国最近的历史清楚地表明教会在为社会对话创造条件方面的积极作用，这种对话在30年前导致了波兰和平、民主的变革。

正如主席国联合王国编写的出色概念说明（S/2019/871，附件）所指出的那样，社区和信仰领袖可以在各级和解努力中，特别是在解决宗教和信仰自由问题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有鉴于此，宗教间和文化间对话对于建设持久和平至关重要。为了使这一对话产生实效，必须本着诚意，在了解、相互理解和宽容的基础上进行。

8月22日，我们第一次纪念了基于宗教或信仰的暴力行为受害者国际纪念日，这是大会根据波兰的倡议，在跨区域国家集团的支持下设立的。我们认为，这一举措将积极促进打击基于宗教或信仰的仇恨犯罪和暴力行为，并进一步加强宗教间对话和对宗教多样性的尊重。它创造了一个讨论的平台，让人们听到受害者和幸存者的声音。

去年8月在波兰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举行的第一次专门讨论这一议题的“阿里亚办法”会议证明，受害者的声音虽然令人心碎，但给了我们希望，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主席**（*以英语发言*）：德国代表请求再次发言。

**霍伊斯根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俄罗斯代表的发言是对国际司法制度的正面攻击，而德国认为国际司法制度是和解的关键。在这方面，我想问俄罗斯代表三个问题。

首先，关于今天作为国际法庭参照点的纽伦堡审判，他是否认为这些审判是错误的，不应该进行？第二，关于他所批评的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他是否认为姆拉迪奇先生和卡拉季奇先生由该法庭审判是错误的？第三，关于他对双重标准的指责，他是否承认在海牙设立了一个特别法庭，来审判科索沃解放军作战人员可能犯下的危害人类罪？

**主席**（*以英语发言*）：俄罗斯联邦代表请求发言进行答复。

**列普金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的理解是，这些问题是向德米特里·波利扬斯基先生本人提出的，眼下他与秘书长一起正在参加一项活动。他无疑会对此作出回应。我不想把民族和解这一重要问题变成一种坦率地说是在翻旧账的做法。无论如何，我们将以双边形式对他作出回应。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提醒所有发言者将发言限制在四分钟之内，以便安理会能够迅速开展工作。敬请打算作长篇发言的代表团散发书面发言稿，在会议厅内则作简略发言。提醒各位一下，四分钟一到，麦克风上的红色指示灯将会开始闪烁。

我现在请匈牙利外交和贸易部长发言。

**西雅尔多先生**（匈牙利）（*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真诚感谢你本人在这一领域所作的努力。很高兴看到你和你的伟大国家主持安全理事会。我们还赞赏你本人强调一个你已将之列入安理会议程的议题。世界正在发生非常迅速的变化，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正在目睹的新工业革命，而且也是由于许多政治变革正在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并且肯定正在增加世界各地冲突的数量。令人遗憾的是，谈到这些冲突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要解决这些冲突，我们必须承认，在我们的氛围里有太多的虚伪和政治正确性。如果我们要解决世界各地的严重冲突，我们就必须恢复我们国际对话的诚意和相互尊重。我们必须解决我们主要的全球政治困境。老实说，我们必须停止互相抨击、逼迫对方陷入困境或相互评判。我们应当结束污名化和假新闻的散布，这很容易导致无端的冲突，制造紧张关系，并造成有害和危险的局势。

我认为，和解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是承认各民族和各国维护其民族特性以及文化、历史和宗教传统的普遍权利。质疑或挑战这些权利会使和解变得无法实现。同样，认为追求国家利益是一种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想法，也会使和解变得无法实现。认为尊重一个人的宗教传统是倒退行为的想法，或认为可允许高声疾呼的暴力少数群体向沉默的和平多数群体施加压力的思想，也会使和解无法实现。如果我们在全球普遍认识到大家都享有在自己家园过上安全与有保障生活的基本人权，我们就可以帮助实现和解。我们应当把国际努力的重点转向帮助人们返回家园。我们都应当把重点放在为实现这一目标创造必要条件之上。我们认为，在这方面，温和与和平的宗教领袖以及青年人之间文化对话的作用极为重要。

就匈牙利而言，我们特别强调支持世界各地受迫害的基督教群体，使他们不会被迫离开家园，可以在当地生活在和平的条件下。我们还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在匈牙利学习，由匈牙利国家全额资助，与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其他青年人会面，接触不同的文化和宗教背景，并学习如何相互尊重和共同生活。本学期，我们接待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背景的7440名学生在匈牙利学习。下学期，这个数字将增加到9500。我们真诚地认为，如果我们能够为来自不同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的青年人提供这种见面的机会，这就是我们能够帮助实现和解的最佳途径。

最后，主席先生，我们再次感谢你和联合王国为促进和解作出如此巨大的努力。虽然我们是一个资源非常有限的小国，但我保证我们将作出自己的贡献，以便实现这一非常重要的目标。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挪威代表发言。

**尤尔女士**（挪威）（*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北欧国家，即丹麦、芬兰、冰岛、瑞典和我国挪威发言。我们感谢联合王国举行这次重要的公开辩论会。

在向持久和平过渡的进程中，必须重建关系，必须让受害者的权利成为任何和平进程的核心。《哥伦比亚结束冲突和建设稳定持久和平的最终协议》为解决受害者的权利、过渡时期正义与真相确立了新的标准。包括受害者和妇女在内的各界广泛参与谈判是至关重要的。这导致成立了真相委员会、和平特别司法管辖机制、以及失踪人员国际委员会，这些机构现已全面运作。

尤其是在饱受战争蹂躏和两极分化的社会里，民间、社会和宗教领袖的声音和领导作用对于确保开创和解与对话的动力至关重要。南非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其和解进程一直激励着许多建设和平的努力。宗教间和宗教内部的对话可能被证明是至关重要和有益的政策工具，有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与可持续和平。宗教界行为体可以为了解不同地方社区并与之合作提供一个途径。

在任何冲突中，和解努力必须包括受影响社区及其民众，并由他们当家作主，但联合国拥有强有力的工具，可用来帮助各方实现和解。我要强调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发挥这一作用的五种方式。

第一，安全理事会必须长期参与，以便不仅促进而且也维持和平。它必须充分利用其所掌握的一切工具，促进和解，包括在敌对行动可能即将爆发的阶段这样做。

其次，安理会必须继续与包括非洲联盟在内的各区域组织发展伙伴关系。区域行为体常常最有条件为持久和解提供支持。

第三，建设和平委员会可以为保持和平发挥重要作用，其作用和资源应当得到更好的利用。

第四，联合国必须协助解决冲突的根源。应尽可能将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与保持和平联系起来。

第五，我们支持秘书长呼吁大力开展和平外交，我们欣见最近为此目的实施联合国改革。我们必须发挥联合国国家工作队、调解支助股、联合国维和行动和特别政治任务的优势。联合国系统现在应当更有条件采取整体做法，将促进安全、发展与人权联系起来。

在所有这些努力中，增进妇女权能是关键。将半数人口排除在缔造和平的工作之外是行不通的。如果我们要建设有复原力的强大社会，与年轻人接触和协作也至关重要。

最后，北欧国家谨强调，只有联合国各会员国确保本组织获得所需的适足资源和支持，以便在和平努力中发挥有效作用，上述各点才有可能实现。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与我国大臣一道，请各位发言者将其发言限制在四分钟之内。如果我们不遵守时限，有些同事将无法在今天的辩论会上发言。为帮助和指导讨论，我要说，主席认为没有必要感谢我们召开本次辩论会，也不必为我们选择这一议题而赞誉我们的智慧和远见卓识。时间达到四分钟之后，指示灯将开始闪烁，然后，我非常友好的同事将递上一张纸条，请发言者结束发言。

我现在请瑞士代表发言。

**劳贝尔先生**（瑞士）（*以法语发言*）：超过15年以来，瑞士一直支持和协助许多伙伴国的过渡司法和处理历史问题的其他努力，各国社会力图以这些方式处理他们所经历的暴行。瑞士相信，在合适的境况下，处理历史问题有利于实现和解。我们赞同一些代表团今天上午的发言，我们始终相信，国内和国际刑事司法对于和解和持久和平极其重要。

在这方面，我要强调三个问题。

首先，如果我们要帮助转变关系——这是和解的核心内容，采取基于进程的方法至关重要。处理历史问题的努力必须是整体性的，并经过恰当排序。零零散散有时是从外部强加的倡议常常加深而不是修补社会裂痕。联合国、包括安全理事会内部

及其与国家当局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必须进行持续协调并采取一致行动。我们还同一些安理会成员一道，强调建设和平委员会在这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其次，经验显示，地方一级所作的努力很有机会获得成功。当地做法产生一些具体倡议和技巧，在国家结构中的其他各级也非常有用。联合国、包括安全理事会应当促进这些积极动态并为其提供助力。当这些倡议有可能侵犯人权或违反国际法的其他强制性规范时，联合国负有提高利益攸关方认识的重要责任。

第三，包容性是关键。国家当局以及适当情况下国际社会必须担负起争取和解的首要责任，但是仅靠政治精英之间的对话不能确保持久和平。其他政治和社会团体的领导人和代表，包括妇女、青年人和少数群体代表，也必须加入该进程。例如，宗教领袖发挥关键作用，他们了提供社会服务以及精神和道德指导。他们常常影响着塑造一国政治文化的价值观和言论。

联合国可以更好地与更多种多样的对话者接触。安理会必须认识到民间社会在和解和建设和平方面的重要作用，很多来到安理会的民间社会通报人证实了这一点。安理会必须对其议程上有关必须保护人权维护者的项目采取明确立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发言。

**Alhefeiti夫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主席先生，我们感谢你召开本次重要辩论会，并表示赞赏联合王国为支持全球和平与和解进程所作的努力。我们也欢迎塔里克·艾哈迈德勋爵在其发言中重点阐述宗教群体间和平共处问题，对我国而言，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中东正在经历一个关键时期，面临各种复杂挑战，但是，如果以智慧和耐心应对当前形势，并启动坚决反对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的政治进程，当前形势有可能创造机会，在尊重各国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地区秩序。从这个角度说，调解与和解进程可缩小分歧，支持达成符合国际法和各国人民合理愿望的政治解决，特别是反对派别纷争和屈服、寻求建设强大而且有能力的民族国家的愿望。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一向热诚弘扬宽容和对话原则，以避免本地区更多的冲突和战争。宽容对于和解至关重要。我国不是将宽容仅仅作为一个口号加以宣传，而是将其作为我国内外政策的支柱，并为此采取多种举措和实际步骤。例如，自从宣布2019年为宽容年以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启动了1500多项举措，在国内外宣传和平共处以及文化与宗教交流的价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还与教科文组织合作，为重建被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损毁的摩苏尔的若干古迹和文化遗址提供支助，这是我们努力传扬开放与温和工作的一部分。

在这方面，我们敦促联合国继续努力营造当地族群间和解的环境，尤其是那些饱受冲突蹂躏的族群。本组织七十多年来丰富的和解经验可提供和解的作用方面的有益的经验教训和最佳做法，同时顾及地区和当地情况。

只有与全面的建设和平进程齐头并进，和解才能实现，这种建设和平进程包括加强法制，维护国家机构，并为受冲突影响者提供重建和支持。在这方面，我们敦促国际社会确保社会全体成员的广泛参与，尤其是妇女和青年人参与，因为他们在推动和平进程并使其取得成功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不能忽视区域组织和邻国在调解与和解方面可发挥的积极作用，因为它们拥有广泛的知识和专长，而且确保区域稳定符合其直接利益。为此，我们赞赏兄弟的沙特阿拉伯王国真诚努力整编也门军队，并为达成利雅得协议发挥关键作用，该协议加大了应对也门面临的风险和威胁的工作力度。同样，苏丹境内调解努力的成功凸显出区域组织和邻国在和平解决冲突中可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敦促安全理事会按照《联合国宪章》第八章，加紧与各区域组织开展协商。

最后，我们谨指出，和解进程不会一蹴而就，也不是仅仅签署了协议就能成功。和解需要持续不断地逐步努力，以治愈冲突留下的创伤，还要为和平共处奠定坚实基础。我们曾强调过，冲突各方应当秉诚参加调解与和解进程。它们决不能利用这样的进程追求政治目的，必须停止滥用大众媒体来助长紧张局势。我们申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致力于传扬宽容和共存的原则，致力于寻求政治解决方案，这是解决我们大家共同面临的诸多挑战的最佳方式。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非常高兴地欢迎日本大使第一次来到本会议厅，我请他发言。

**石兼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我昨晚刚刚抵达纽约，这是我作为日本新任常驻代表参加的第一次会议。我非常感谢能在本会议厅出席会议。

2000年，安理会听取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绪方贞子夫人关于建设和平的简报，其重点是和解（见S/PV.4219）。绪方夫人在通报中指出，对她的机构来说，建设和平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她看到，在仍然存在严重分歧的族群中，回返者有着具体需求，有时是极为迫切的需求。她说，她正在探索新的途径，特别是促进族群共存方面的途径，作为走向和解的第一步。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卢旺达和波斯尼亚的回返者地区发起了一个名为“想象共存”的项目，该项目主要开展支持基于社区、跨族裔的小型创收活动，围绕这些活动，他们建立了体育等其他活动类别。

绪方夫人于上个月去世，自她在安全理事会会议厅发言以来已有将近20年。尽管如此，我认为她关于如何实现切实和解的想法和行动并没有过时。她是建设和平领域的真正开拓者，她大力促进人的安全，将被人们铭记。

在随后的20年中，日本一直寻求在绪方夫人工作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努力解决世界上遭受破坏地区的和解问题。我们支持了几个国家的民族和解进程，并将继续这样做。基于这一经验，我今天要强调日本认为支持持久和解进程所需要的三个关键要素。

首先，它们必须包容各方，欢迎妇女、青年、社区领袖和信仰领袖以及私营部门的声音。第二，它们必须提供社会经济发展机会，确保受不平等现象影响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获得就业机会。第三，它们必须有可持续的框架，以便建立具有广泛国家自主权的强大机构。

上述三个要素——包容性、社会经济发展和强大的机构——不是独立的，而是整体的一部分。那么，作为国际社会，我们如何才能加快这三个要素促进和解的速度？我们认为，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确保我们的努力反映出实地人民的声音。每个和解过程都是独一无二的，都必须包含这一进程参与者的个人观点。因此，我们需要确保以人为本的做法，强调人的安全这一价值观。

我还要指出，建设和平委员会是一个重要平台，通过它的召集作用以及对安理会的咨询作用，我们可以分享良好做法并吸取经验教训。建设和平委员会与建设和平基金一道，可以帮助纽约与实地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最后，我谨重申，日本认为，和解在解决冲突根源和促进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危地马拉代表发言。

**卡斯塔涅达·索拉雷斯先生**（危地马拉）（以西班牙语发言）：危地马拉认为，《联合国宪章》第六章作为和解的基石，极为重要，该章提到和平解决争端，第七章提到维护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也是如此。

作为一个促进和平的国家，危地马拉认为和解是对斡旋和调解的补充，根据国际法，斡旋和调解被认为是预防或解决争端和冲突的重要措施。如果充分提前启动和解进程，以解决冲突的根源和动

态，同时考虑到受影响民众的传统和社会政治特点，就可以及时预防冲突。

安理会知道，我国曾受到国内武装冲突的影响，这场冲突于1996年签署了坚定和持久的和平协定后宣告结束。我们欢迎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当时为执行这些协议所作的努力。根据我们的经验，危地马拉坚信，国际社会的努力必须以国家社会政治和历史背景为指导，以确保突出自主权。换句话说，冲突后社会和解进程的各方可以解决分歧的根源，以确保和解努力不会付之东流。

落实地方领导是所有民族和解进程中的重要因素。我们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地方和社区领导人有助于确保和解进程行之有效，产生长期成果。在许多情况下，市长、州长、社区领袖等民选领导人以及信仰领袖和宗教领袖定下基调，确保特定和解进程中现有的分歧能够得到克服。这种努力尤其有助于联合国的举措，也有助于秘书长特使或特别代表以及维持和平行动和政治特派团开展的工作。

安理会拥有各种工具来加强民族和解进程。2016年通过的同文决议、即安全理事会第2282（2016）号决议和大会第70/262号决议重申了保持和平的概念。根据这一概念，国际社会决定在任何冲突局势中，都必须在全面的和平与安全框架下，处理遵守和尊重人权、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将一种传统做法强加给另一个国家，而指望立即对社会和平产生积极影响。和解和赔偿过程需要时日。然而，必须重振这些努力，把满足民众的需求作为基础，如果这些需求得不到满足，就可能导致冲突，包括侵犯人权、剥夺机会和社会排斥现象。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回顾第1325（2000）号决议的内容，该决议强调妇女作为解决冲突的重要利益攸关方的重要性。妇女是积极变革的推动者、高效的管理者，也是了解其直接环境现实的专家。因此，她们作为和解的推动者，参与和平与和解进程至关重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肯尼亚代表发言。

**姆万吉女士**（肯尼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赞扬联合王国召开今天及时和重要的讨论会，我们在讨论中探索可实施的行动，以便将多边社会团结在国家自主和国家主导的和解进程周围。

民族和解是一种过渡期正义现象，也是一项全面的努力。国家的价值观若支持巩固民主，就可以为民族和解论坛提供空间。因此，进行讨论和定期交流是有益的，这些讨论和交流可以借鉴最佳做法，解决持续存在的挑战。这种情况涉及但不限于受冲突影响的国家。有效的民族和解进程是帮助整个国家集体和包容地解决重要民族问题、包括追忆日和纪念日的重要工具

保护证人、受害者和面临报复或恐吓风险的个人至关重要，这样才能使这一进程具有公信力并促进公众参与。相关的法律改革也可以提高效率和加强问责制。国家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发挥着关键作用。这种委员会的多样性涉及所有族裔、地区、宗教团体和政治观点，将确保得到人们的广泛接受。

借助既定的传统调解与和解进程，可以确保民众接受和解进程。确定关键的行为体、包括得到信赖的信仰领袖和社区领袖，并将他们融入其中，对于确保国家、传统和地方一级的和解举措协调一致、包容各方，以确保可持续性至关重要。另外还必须创造空间，整合地方行为体、民间社会和学术界的其它举措，以支持民族和解。学校和大学是重要的合作伙伴。鉴于民族和解具有敏感性，必须高度重视和解进程的技术方面，如数据存档。我们欢迎安理会倡议让民间社会和学术界的代表作为今天的主要通报者。

请允许我分享从肯尼亚的经验中汲取的一些实际教训。继我们2017年的选举之后，乌胡鲁·肯雅塔总统阁下和反对党领袖拉伊拉·奥廷加先生阁下同意开展一个被称为"握手"和"搭建桥梁倡议"的民族和解进程。这极大地改变了肯尼亚的社会政治和

经济面貌，并且证实，卓有成效的领导力是带头走和平之路的关键。握手使国家走上和解之路，为恢复日常社会经济活动创造了空间，并且使我们走上为今世后代创建一个统一的肯尼亚这条道路。

“搭建桥梁倡议”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进程，侧重于应对各种形式的对抗和竞争、确保包容性的挑战以及政务服务权力下放问题，加强安全和安保，消除腐败，促进共同繁荣以及保障权利受到保护。我们希望该倡议将转化为具体的政治成果。

妇女领袖一直处于肯尼亚建设和平和搭建桥梁活动的最前沿，并在幕后开展工作。200多名妇女也接受了培训，并积极参与各县族群冲突调解工作，包括由妇女主导的“支持妇女为肯尼亚搭建桥梁”运动，这是在基层实施握手倡议的战略之一。

最后，国际社会的作用应该是应联合国各会员国的请求提供支持，以便建设国家和基层解决冲突与和解倡议的能力。正如各位通报者着重强调的那样，我们赞扬建设和平委员会和建设和平基金努力投资于民族和解进程。若从国家自主权的角度来处理问题，财政和技术支持会更具有价值。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任务授权仍应属于会员国的权限，以便能够规定一个推动全面和解进程的时限。安全理事会可以在过渡期正义这个整体框架内，系统、切合实际地将国家主导的和解进程纳入其工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巴西代表发言。

**维埃拉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联合王国举行本次关于和解在保持和平中作用的重要辩论会。我也感谢通报者的宝贵看法。

巴西有着倡导将建设和平纳入联合国主流的悠久历史。在重申我们支持这一议程的同时，我想进一步探讨两个专题。

2016年关于审查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的大会第70/262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第2282（2016）号决议都强调了和解的重要性。这两项决议之所以得以通过，是因为我们集体认识到，保持和平不止需要通过维持脆弱的停火协议遏制敌对行动。实际上，保持和平的构想要求致力于实现稳定和恢复这项大任务，这两个方面都需要国际社会的长期参与。我们唯有解决冲突的根源并加强推动和平的力量，包括通过预防、调解与和解努力，才能实现持久和平。通过帮助修补受冲突影响社区社会结构中最严重的裂痕，和解在保持和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和解的核心在于根据社会的共同愿景促进社会团结和包容。确保在各阶层人口中公平分配和平红利也是和解的关键。

巴西支持亚洲以至拉丁美洲等各区域国家的冲突后和解努力。这些经验表明，成功的和解没有单一的模式。国家自主权对于确保和解进程符合每个国家的独特情况至关重要。尽管如此，安全理事会确实有责任支持国家主导的和解努力，当这些努力是过渡局势中的一个关键优先事项以及实现稳定与持久和平的一个关键门槛时，尤其如此。同样至关重要的是，安全理事会应保证联合国对和解努力的支持完全符合国家确定的建设和平与发展优先事项。和解与经济振兴、复员战斗人员和弱势群体重返社会、安全部门改革以及促进和保护妇女、青年和儿童的权利等其它建设和平因素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最后，请允许我再次重申，建设和平架构对联合国和平与安全努力的效力越来越重要。仅举一个具体例子，去年，建设和平基金为非洲联盟主导、促成《中非共和国和平与和解政治协议》的调解倡议提供资金，从而为中非共和国实现和平做出决定性的贡献。建设和平委员会在延长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任务期限期间向安理会提出建议，同时也提供了自身的专门视角，强调政治进程以及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的作用。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建议之所以能够增添价值，是因为其组成具有普遍性，并能够把重点放在为和平奠定基础上。建设和平委员会成立于21世纪，因而似乎具有更强的

适应力，可以从更广泛的角度讨论和平努力，寻求国家自主解决当代和平与安全挑战。

铭记这一点，巴西坚决鼓励安全理事会在讨论所有维和行动和政治特派团的任务期间，征求建设和平委员会的专门意见。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些机构之间加强协调可以带来积极变化，有利于更具包容性的和平与和解进程。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意大利代表发言。

**扎皮亚夫人**（意大利）（*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联合王国举行本次公开辩论会。我们也感谢秘书长和今天的通报者。

意大利赞同将由欧洲联盟观察员所作的发言。

经验表明，在促进和平与安全方面，以和平手段预防和解决争端是最佳也是最经济划算的解决办法。成功之道没有什么单方。鉴于每一场冲突和其后的解决办法都不同，相关的和解进程也可能各异。然而，我们必须考虑到一些因素。

首先，和解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时间，不可操之过急。它不仅适用于受害者和施害者，也适用于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因此，它必须由国家主导，而非强加于人。它必须在从国家到基层的所有层面上进行，并且包容各方。当地社区、宗教领袖和民间社会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他们的地位独特，因而能够接触和代表社会的大部分阶层。

特别是，妇女的参与对于保证这种包容性至关重要。然而，今天很少有妇女参与和解与调解努力。为了消除这些限制，意大利启动了地中海妇女调解人网。我们为迄今取得的成果感到自豪。新成员已经加入；塞浦路斯和土耳其的头两个本地分网得以设立；提供了培训、能力建设和联网机会；并与联合国、非洲联盟和其它区域网络形成了富有成效的合力。最近的成就是建立了区域妇女调解人网络全球联盟，该联盟于9月份在纽约成功启动。

其次，为了维护持久和平，国家和地方和解倡议之间必须有一种关联。意大利坚信地方当局和社区能够为和解进程做出重要贡献，在这方面，我谨以利比亚和马里两国为例。事实证明，宗教领袖和民间社会是主要的伙伴。其中一个例子是圣艾智德团体支持中非共和国和平进程，力求在工作中达成审慎平衡：既必须确保问责，又不损害和解进程的最终成果。另一个例子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全国主教会议在该国近来政治危机中的关键作用。我谨回顾我国的一个最佳做法即意大利非政府组织Rondine Cittadella della Pace的活动，该组织致力于对年轻一代进行解决冲突、第二轨道外交以及促进和平与人权方面的教育，从而减少全球的武装冲突。

最后，要使和解成为一个有效的工具，联合国和会员国就必须继续以一种系统和全面的方式看待该进程。例如，在拟订和平行动的任务授权时，可行和精确的目标结果应该与和解活动挂钩，特别是连接国家和地方视角。建设和平委员会也可成为监测该进程的一个重要平台。2020年对建设和平架构的审查也可提供一个加强这种作用的契机。作为会员国，我们的贡献至关重要。我指的是我们作为部队派遣国的行为，在这方面，我们的对话和召集敌对方的能力可在和解进程中带来切实的不同。

最后，请允许我回顾我们将于12月6日和7日在罗马主办的第五次地中海对话，这是我们不懈努力为对话与和解创造机会和搭建平台的一个例子。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葡萄牙代表发言。

**Vaultier Mathias先生**（葡萄牙）（*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祝贺联合王国举行本次及时的辩论会。葡萄牙充分肯定和解对于确保和平协议稳固立足、冲突不再复发以及为可持续和平奠定基础的重要性。我们对东帝汶和安哥拉和解进程的更直接贡献带来了宝贵的经验。

每个大陆都有和解的成功例子。安全理事会的一些现任理事国就有引人瞩目的一手经历。然而，

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功，分裂与冲突势力仍在破坏家庭，撕裂社区，破坏国家稳定，并且散布不稳定。

和解恢复或者再创把社会凝聚在一起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项目。为此，它不能成为和平协议后的某种事后想法，而必须从任何和平努力的一开始就被纳入政策框架。建设和平委员会可通过制订冲突后的建设和平与恢复综合战略，来发挥重要作用。它协调各相关行为体、确保通过建设和平基金来催化融资并且调集其它适当资金的能力也必须加以利用和提高。

和解还必须依赖国家调配，得到全社会的参与。为受冲突影响的个人和族群伸张正义可在化解仇恨和推动复原方面发挥核心作用。过渡期正义的工具如真相委员会、独立实况调查团以及仲裁机制等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我们应学习这些最佳做法，以处理各种独一无二的冲突后局势。

妇女在和解中的作用理应得到特别关注。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第1325（2000）号决议仍是这方面的里程碑。葡萄牙现正执行其落实第1325（2000）号决议的第三次国家行动计划。我们呼吁各会员国制订本国的行动计划，支持妇女在建设和平、包括在和解中发挥作用。同样为了这个目的，我们也加入了地中海女性调解人网络。

青年的重要作用也是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今年6月份，葡萄牙在里斯本举行了2019年世界青年事务部长大会和青年论坛里斯本+21，会议的结果是，各国政府和青年代表通过了《关于青年问题政策与方案的里斯本+21宣言》。该文件肯定了青年对和平进程以及预防冲突和解决冲突的贡献。

最后，请允许我用这种希望的语调来结束发言：亟须让青年在和平进程中发出声音，和解也许在冲突后必不可少，而青年的参与则使和解还成为预防冲突的一个有力工具，体现出我们维护未来和平与安全的共同目标。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纳米比亚代表发言。

**格策先生**（纳米比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祝贺联合王国担任安全理事会11月份主席。我感谢你举行今天关于这个重要话题的公开辩论会。

审视一下延绵不绝的未决冲突名单和安理会每年在辩论和寻求解决这些冲突上花费的时间，恕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和平一定是枯燥无趣的。否则，我们如何解释冲突的持续存在？当然，我们肯定该问题的严肃性，因此，我们想在发言的伊始强调，和平要取胜，就应该首先防止冲突。

为此，预警和情报收集至关重要。要想取得成功，怨恨方之间就必须进行对话。我们承认，对话的成功与各方解决冲突的意愿有关。在这些谈判之后，要维护和平就需要不断对话，以帮助各方调和。

和解长期以来被认定是暴力和冲突之后，各国在其实现全面和平与稳定的道路上必经的关键一步。如果我们想确保冲突不再复发或者重燃战火，双方就必须进行某种形式的和解。和解是任何建设和平进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解要求必须处理政治、社会、司法以及经济领域的结构性不公。和解可采取不同的形式，最值得一提的是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和法院系统。联合国长期在倡导和确保和解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纳米比亚独立之时，继奉行分而治之原则的种族隔离体系瓦解之后，我国面临和解与建国的艰巨任务。纳米比亚有幸得到联合国特别代表爱尔兰的肖恩·麦克布赖德和芬兰的马尔蒂·阿赫蒂萨里以及其他人的帮助，他们与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一道不懈努力，实现国际上可接受的纳米比亚向独立的过渡。

我国不得不回到基本点，确保纳米比亚作为“一个纳米比亚、一个国家”携手共进的同时，能够享有自由、和平以及稳定。今天，我们感到自豪的是，纳米比亚成功地把我们解放斗争期间的两

个交战派别，即为南非种族隔离政府作战的一方和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军整合为一支统一的国防部队。

随着2005年建设和平委员会（建和委）的设立，联合国进一步强调了建设和平与和解的重要性。建和委的目的是为冲突后的建设和平与恢复提供综合战略，召集各相关行为体，并且调集资源。特别是，建和委倡导并且确保在和平进程中纳入青年和妇女，他们是和平与和解进程中的两个关键行为体。

但是，纳米比亚愿警示，推动和解方之间对话的必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的同时，外部参与方在该进程中的影响也不应忽视。有些情况下，外部参与方的既得利益可危及和解进程的危险真实存在。

在纳米比亚准备明年3月庆祝独立30年之际，我们为已经采取步骤以确保平稳过渡到一个独立和自由的国家深感骄傲。在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的重要帮助下，我们的和解进程基本取得了成功。下周我们将举行第六次总统选举和大选，这一事实明显证明了这种成功。

世界各地，特别是中东和非洲大陆的一些国家继续受到冲突和暴力困扰的同时，另一些国家却在摆脱冲突和暴力。和解进程应该构成一切和平进程的基本要素，并应该纳入妇女。不同形式的和解可以治愈创伤，揭露真相。它仍然是确保一国和平、安全、和谐与繁荣的基本步骤。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欢迎巴基斯坦大使来到安理会，他是本届任期内首次在安理会发言。

**阿克兰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祝贺联合王国担任本月主席并组织今天的辩论会。

和解是冲突后建设和平的一个重要专题领域。我记得2004年在安理厅参加过一次关于民族和解的辩论会（S/PV.4903）。我欢迎恢复对这一重要问题的审议。

我们也要感谢古特雷斯秘书长和厄泽尔登姆先生所作的通报。

明年将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我们不要忘了，联合国本身就是和解的象征。本组织诞生于这样一个信念：敌意与不和确实可以消除，各国可以超越分歧，建设共同的未来。两次毁灭性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和平与合作的发展就说明和证明了政治和解的益处。我得补充一点：我确信英国脱欧不会扭转这一局面。

多年来，我们在调解冲突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例如在科特迪瓦、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巴基斯坦的维和人员为结束这些旷日持久的战争和冲突做出了贡献。应保持这种努力，但要避免一刀切的做法。巴基斯坦不仅是联合国维和的主要部队派遣国，自2005年建设和平委员会成立以来也一直是其成员。我想根据我国的经验分享几个要点。

首先，牢牢扎根于包容性原则和以受害者为中心的过渡期正义原则的国家自主的和解进程最有希望重建和保持和平。第二，和解是一个长期进程，不应取代问责；这两个进程应该相辅相成。第三，包容性是推进国家建设和平进程的关键。必须让所有族群加入，理智地处理他们的关切。第四，发展是在饱受冲突的社区重建和平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其本身并不足够。必须找到并解决冲突的根源。

巴基斯坦支持阿富汗人主导、阿富汗人所有的和平进程。我们希望在昨天彼此释放人质和囚犯之后，和平进程将迅速得到恢复。此外，我们收容了300万阿富汗难民。他们应该重返家园，在我们希望不久后将启动的阿富汗人内部的和解进程中发出声音。国际社会必须支持阿富汗难民早日有尊严地回返。

随着全球各地冲突的继续，和解仍将是冲突后建设和平的一个相关机制。然而，联合国的核心宗旨是防止和解决冲突，拯救后世免遭战祸。不幸的

是，安全理事会在处理威胁和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这是其主要任务——方面的业绩参差不齐。它的努力及其结果都是不一致的。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看到安理会迟迟不采取行动并保持缄默。

尤其令巴基斯坦深感关切的是，安全理事会没有采取行动制止印度在有争议的查谟和克什米尔邦侵犯人权和违反安全理事会决议的行为。相比之下，安理会在其他情况下被迫快速诉诸制裁和强制执行。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国际社会的政治意愿和承诺。全球国防支出中用于和平的不到0.5%，这有力说明了建设世界和平所需的承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以本国代表身份向巴基斯坦代表简单保证，联合王国在脱欧之后仍将在欧洲经济和安全方面发挥有力作用。

我恢复安理会主席的身份。我要感谢我们口译员的忍耐。本次会议的名单上还有一些发言者，征得安理会成员同意，我打算暂停会议，下午3时整复会。

下午1时05分会议暂停。